

换副眼光看民国学术

叶嘉莹 陈斐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中西思想文化、旧学新知碰撞、交融发生的“化合”反应，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既有固守传统观念、家数者，也有采用新观念、新方法者，还有似新却旧、似旧还新、新旧间杂者……只不过长期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我们对这段学术史的梳理、回顾往往彰显、肯定的是那些和西学类似的论著及面相。

1911年清帝逊位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般称为民国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政局不稳、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但思想、学术、文化却殊为活跃、异彩纷呈。主编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刘梦溪先生就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在后‘五四’时期所创造的实绩，使我们相信，那是清中叶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繁盛期和高峰期。而当时的一批大师巨子……得之于时代的赐予，在学术观念上有机会吸收西方的新方法，这是乾嘉诸老所不具备的，所以可说是空前。而在传统学问的累积方面，也就是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后来者怕是无法与他们相比肩了。”（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3—124页）

的确，民国学人撰写的学术论著，虽然限于物质条件和学科发展水平，有些知识需要更新，有些观点有待商榷，有些论述还要深化……但仍然接续、充盈着中国固有学术的人文义脉和精魂，更具有为国家民族谋求出路、积极参与当前文化建设的现实关怀，更具有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打通文史哲、将创作和研究相结合的开阔视野和博通气象，更具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题》）的传世期许和实事求是、惜墨如金的朴茂之风。这在人文学术研究显现出“技术化”“边缘化”“碎片化”“泡沫化”等不良倾向的今天，颇有借鉴意义。而且，那时的不少论著奠定了后续研究的基本框架，不管就论析之精辟还是与史实之契合而言，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诗学》主编蒋寅先生即深有感触地说：“最近为撰写关于本世纪中国诗学研究史的论文，我读了一批民国年间的学术著作。我很惊异，在半个世纪前，我们的前辈已将某些领域（比如汉魏六朝诗歌）的研究做到那么深的境地。虽然著作不太多，却很充实。相比之下，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实际的成果积累与文献的数量远不成比

例。满目充斥的商业性写作和哗众取宠的、投机取巧的著作，就不必谈了，即使是真诚的研究——姑且称之研究吧，也存在着极其庸滥的情形。从浅的层次说，是无规则操作，无视他人的研究，自说自话，造成大量的低层次重复。从深层次说，是完全缺乏知识积累的基本学术理念……许多论著不是要研究问题，增加知识，而是没有问题，卖弄常识。”（蒋寅：《热闹过后的审视》，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陈寅恪先生曾将佛学刺激、影响下新儒学之产生、衍行看作秦以后思想史上的一“大事因缘”（《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近代以来的大事因缘，无疑是在西学的刺激、影响下发展本土学术。中国传统学术需要外来学说、理论的刺激与拓展，既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惠赐的绝佳良机。中华民族一向不善于推理思辨，更看重文学的实用价值、追求纵情直观的欣赏。中国语文亦单体独文，组词成句时颇富颠倒错综之美。而且，古代书写、篆刻相对比较困难，文人往往集评论者、研究者、作者、读者等多重身份于一体，彼此间具有“共同的阅读背景、表达习惯、思维方式、感受联想”等等。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觉的而不是理论的，是诗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点式的而不是整体式的”（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111页）。反映在著述形态中，便是多从经验、印象出发，以诗话、序跋、评点、笔记、札记等相对零碎的形式呈现，带有笼统性和随意性，缺乏实证性和系统性。近代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如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在西学的熏沐、刺激下憬然而醒，积极汲取西方理论和方法，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胡适、傅斯年等民国学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旋律鼓动下，

掀起蓬蓬勃勃的“新文化运动”，更加全面地引入西方理论、观念、方法、话语等等，按照各自的理解和方式应用在“整理国故”实践中，在西学的参照下重建起现代学术。此后中国学术的发展，大体是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拓展、深化。民国学人的开辟、奠基之功，可谓大矣！

中华民族素来以“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郭象注《庄子·天运》语）的观点看待历史和当下的关系。我们生逢今日之世，接续传统、回应西学，实为需要承担的一体两面之重任，缺一不可：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继承，就没有东西和别人交流，永远趴在地上拾人遗穗，甚或没有鉴别力，将“洋垃圾”当“珍宝”供奉；而固步自封、无视西学，又会错失时代赋予我们的创新良机，治学难以“预流”。相对而言，经历了百余年欧风美雨的冲刷和众所周知的劫难之后，如何接续传统越来越成了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和出版界携手，大量译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和海外汉学研究论著，如影响颇大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海外中国研究”等，皆有数百种之多。这些论著的译介，于本土人文学术研究开拓视野、更新方法等功不可没，但同时，一味模仿海外汉学风格的不良倾向也见诸学界，所谓“只要西方思想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人“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种模仿或套用，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和论题选择上，有时甚或反映在价值取向和情感认同中。有学者将这称为“汉学心态”，提到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的高度予以批判。在此背景下，自言“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的费孝通先生，晚年阅读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前辈的著作，敏锐思考和回应信息交流愈来愈便捷的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转型的挑战，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个获得广泛共鸣的议题，呼吁

当下最紧迫的是培养“能够把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底的老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继承下来的队伍”（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是文化的核心，“学术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应有之义和关键所在。近年哲学界“中国哲学合法性”、文学界“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美术界“构建中国美术观”等讨论颇热的话题，皆可看作本土“学术自觉”的表征，共同汇聚成“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时代命题。站在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民国学人的论著无疑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启示。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中西思想文化、旧学新知碰撞、交融发生的“化合”反应，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既有固守传统观念、家数者，也有采用新观念、新方法者，还有似新却旧、似旧还新、新旧间杂者……只不过长期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我们对这段学术史的梳理、回顾往往彰显、肯定的是那些和西学类似的论著及面相。然而，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升理论创新能力成为时代命题的崭新历史条件下，恰恰是那些被遮蔽的论著及面相，更具有参考价值。因为治学如积薪，以对西学的理解、借用而言，我们已后来居上，倒是这些论著在古今中西的通观视域中，坚守民族文化本位立场，汲取西方学术优长，进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尝试和努力，长期以来被以“保守”、“落后”的判词给予了冷眼、否定，今天值得换副眼光、花点工夫好好提炼、总结，因为这正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可能萌芽。诗学研究因为与创作体验、母语特性、民族心理、文化基因等关系更为密切，这方面的借鉴意义显得尤其迫切、凸出。

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几年，喜欢欣赏、创作诗词的朋友在逐渐增多，中小学加大了诗词教学比重，国家亦强调“做好古籍整理、经典出版、义

理阐释、社会普及工作”，加强对中华诗词出版物的扶持。全社会越来越意识到诗词之于陶冶情操、净化风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性。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诗词传承面临的严峻形势。毋庸讳言，当下诗词氛围已十分稀薄，能够切理履心、鞭辟入里地解说诗词或将诗词写得地道的人非常罕见。大多数从事诗学研究的学者已不再创作，现行评价、考核体系要求于他们的，不过是从外部审视、抽绎出种种文学史知识，这很难说能触及中华诗词的真血脉、真精魂。在此情势下，与其组织人马“炮制”一些隔靴搔痒、搬来搬去的“新著”，不如将传统文化氛围还很浓郁、诗词仍以“活态”传承着的民国时期诞生的有价值的论著重新整理出版：一方面，使饱含着先辈心血的精金美玉不至于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另一方面，也使当下喜欢诗词的朋友得识门径，由此解悟。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任何艺术都有一定的规则、法度，中华诗词的欣赏、创作亦然。初学者尤其需要通过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入门书籍指引，掌握规则、法度。然而，又没有万能之法，“在丰富生动的创作实践

（下转3版）➔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图片：

1960年5月拍摄的中汇大楼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汇报学人

